

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

主编 孙中田 关德富 高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郁达夫

诗词解析

许清友 编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郁达夫 著 李健 编



郁达夫

诗园集

李健 编

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注析系列

主编：孙中田 关德富 高长春

郁达夫诗词解析

许清友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丛书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铁军	玄日善	孙中田
朱自强	吕海江	孙晓娅	关德富
张文东	张 伟	张志浩	吴 里
张洪野	张福贵	逢增玉	高长春
袁国兴	唐树凡	徐 潜	

郁达夫诗词解析

许清友 编者

责任编辑:唐树凡 责任校对:何金涛 封面设计: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长春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4 插页 18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定价:全套 140.00 元(每册 14.00 元)

ISBN 7—80626—444—2/I·104

序

孙中田

中国近现代文学大家几乎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因此当他们开创新文化的时候既是在旧文化基础上的创造，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新旧文化的衔接与过渡。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历史，不能不去认识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这样才能对这些文学大家有一个整体的观照，从而作出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评价。为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丛书。其中选入了龚自珍、林纾、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刘大白、王统照、田汉、郁达夫等人的诗词。每家一百首左右，力图以简要优美的文字，作出解析，以利于了解近现代作家作品的内蕴。

关于旧体诗词在现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也许学术界还有这样或那样的见解，这是自然的事。但是，我们觉得法国哲学家J·德里达无疑是智慧的。他在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中，提出了一个“非等同圆的重复”的理论。认为创新的过程必然从旧圆走出传统，并不断地向传统回归，从而形成一种不完整

圆的轨迹运动。没有破裂、删除、变形，没有回归、重复，必将失去传统；但新圆又并非旧圆的复制。回归与背弃是同时发生的，解构正在新的创造中进行，但这一切并非是二元对抗的；而是互补的。

这见解使我们联想到许多史实，就此来说，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泯灭的。它与传统歧异、裂变，以雷霆万钧之势，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构成划时代的历史风暴。鲁迅说那时节，“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所以是大仗。然而，当时间拉开距离，在新文学的发展中，对于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对传统的承传与创新等事宜，便纳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就许多新文学的先驱者来说，他们为反对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他们自己无疑又是文化传统的承载者和当然的传递者。对此，却在一时之间，失之于理性的调整。事实上，创新之际，从传统出走后仍然需要不断的回归，以便从母体中汲取补养。这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是需要的。

古典诗词的艺术生命与运作繁衍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我国是一个诗的大国。具有丰富的历史遗产，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渊远流长，如何更新变异，构成新文学的内蕴便成为新文学一个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长久以来，在新文学的历史中，古典诗词的形式，存在着，悄悄地运作着，繁衍着，却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新文学合法的“公民”。鲁迅的经验是颇为有趣的。他在回答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洵几句，自省殊亦可笑。”实际上，鲁迅对古典诗词是颇有研究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

爱读屈原的诗，影响所及，他所写下的许多诗歌不仅有着古代民歌、唐诗的影响，而且深具楚辞的风韵。至于“有时也诌几句”，并非可笑实乃是很自然的事。应该说，鲁迅的旧体诗，是他整个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仅以此作为他偶而反映内心思绪的形式，而且构成他的思想和艺术形态的许多名篇。“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这首七律，是鲁迅在1931年为送日本友人增田涉写下的。一位日本友人看过后说，“这些诗句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这是传统文化源流的承传与创造的艺术风范。就整体文学历史的源流来说，这种从传统走出与回归的艺术样式，并没有在新文学的发展中绝迹，而是具有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趋向。

郭沫若1950年在回答《文艺报》读者问中认为不要“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旧式的诗词在今天依然有它相对的生命”。仅以形式来说，它“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在《〈柳亚子诗词选〉序》中他赞颂这位“不寻常的诗人”笔下“不论是雅言或常语”都会像“雕塑家手里的软泥，真是得心应手”。因此他“更希望他的诗歌多多产生，而且更要平易近人，使人民大众能够接受，亦如水，亦如火。所有控制的原子能，能够像水一样普及，像火一样容易到手，那于人民大众是多么大的幸福呵！”这些道理，无疑是可以普泛参照的。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于旧体诗词，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取其精华，发扬光大。对于五四以来的优秀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应视为新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加以研究和承传。

前 言

郁达夫是以浪漫主义小说的独特成就惊动文坛并确立其文学地位的；郁达夫还是一位天赋出众、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早在他的小说集《沉沦》问世之前，就在上海《神州日报》、杭州《全浙公报》和《之江日报》等发表诗作。特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不仅经常在日本《新爱知新闻》上发表大量诗作，而且与日本德高望众的著名汉学家、诗人、日本诗坛领袖服部担风多有唱和之作，成为在日本颇具影响的中国著名诗人。郁达夫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以诗词创作开始其文学生涯^①，而且又以诗词创作结束其文学业绩^②，是作者文学创作历时最长的一种文学样式。因此，他的诗词被誉为作者的“自传”和“诗史”^③。

纵观郁达夫的诗词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累计创作各种诗词 600 余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创作诗词最多的

① 郁达夫最早结集的并不是他 1921 年出版的小说集《沉沦》，而是 1916 年作者自编的 1915 年的诗集《乙卯集》。但因种种原因，此书未能刊印。已佚。

② 到目前为止所见郁达夫最后的作品是 1945 年春写的《题新云山画梅》诗。作者于这年秋天不幸被害。

③ 郭沫若：《〈郁达夫诗词抄〉序》，第 2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出版。

留学日本时期，即 1913 年到 1922 年近十年的时间里，是郁达夫诗词创作最为活跃、也是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据不完全统计，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共创作诗词 300 多首，本书选注的 87 首，尚不足此时期诗词创作的三分之一。这时期的诗词，内容比较庞杂，诗体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有日本风土人情诗、爱情诗、政论诗和作者自述诗等。

写于 1914 年的《日本竹枝词十二首并序》是作者所写日本风土人情诗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竹枝词》最早是由唐代诗人刘禹锡根据一种四川民歌而创造的诗体形式，后来传入日本，在中国却自行消失，直到清末维新派黄遵宪始作《日本杂事诗》，才使这种诗体重新复活。郁达夫正是受到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的启发而创作了《日本竹枝词十二首并序》。其创作目的与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一是为闭关锁国、不思进取的中国提供一个先进的参照；二是让《竹枝词》这种诗体形式重新回到祖国，并努力使之传播与发展。这些诗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写日本的人和事，具有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特点。诸如：以中国古代宫廷辞赋为参照对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推崇，以中国古代封建迷信为参照对日本电影的介绍，以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为参照对日本女子高师，特

^① 为读者阅读方便，此文分析仅以选本为限，不再涉猎选本之外的作品。

别是免费教育的赞扬，以中国古代子虚乌有的传说故事为参照对日本近代科学 X 光的肯定等等，不仅使中国读者耳目一新，而且具有暴露中国社会痼疾的客观效果。此外，像对俄国伟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及其著名作品《复活》在日本广为流传的描绘，亦不失为在中国介绍外国文学之先声。

爱情诗是郁达夫此时期诗词创作的另一重要内容。郁达夫此时期所写爱情诗主要是指作者写给未婚妻子孙荃的诗。如收入此书的《七月十二夜见某，十六日上船，十七日有此作即寄（五首）》，系作者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期间，即 1917 年暑假回国探亲时由父母包办与孙荃在浙江富阳订婚后，在返回日本名古屋的路上所作，并当即寄给未婚妻子孙荃的诗。孙荃是作者原配夫人，并有一子二女长大成人。在一些文学史书里，一提到郁达夫的原配夫人，总是忘不了父母包办，而父母包办又是封建婚姻的同义语。仿佛郁达夫与他的原配夫人根本没有爱情可言。更有甚者，在一些由此改编的影、视剧中，更是将郁达夫的这段婚姻说得一无是处。其实，这是将新旧时代的转换看得过于简单了，将人复杂的感情看得过于简单了。郁达夫写给孙荃的诗对我们正确认识新旧时代的转换，人的感情（包括爱情）的复杂性，均有启发和教益。还应提及的是，郁达夫在他早期的诗词中就深感国家落后和民族的愚昧，并把自己生不逢时、报国无门的感叹与国家政治的腐败、民族的劣根性结合起来，一种难能可贵的忧患意识贯穿其爱情诗词的始终。如果说郁达夫留学日本时期的日本风土人情诗由于多是针对中国社会现实而发，因此不能没有现代中国社会面影的话，那么，作者留学日本时期的爱情诗则几乎可以当作作者的自传来读，具有勿容置疑的史料价值。

政论诗，对郁达夫来说，也许并非所长，但作为一个忧国

忧民的热血男儿，又不能与政治无关。《杂感八首》便是作者留学日本期间的政论诗。此组诗对反动军阀的揭露与控诉，也许不无片面性，但却不无深刻、独到之处，具有明显的认识价值，堪称诗史。至于对各种知识分子，其中特别是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的鞭挞，至今仍有警世作用。

二

归国后的诗，即1922年到1938年近17年间的诗。这个时期虽然时间较长，但其诗词数量远远少于留日时期。这或许与作者将其精力主要放在现代小说、散文创作上不无关系吧。此时期共有诗词160余首，本书选注37首，其中主要有爱情诗、政论诗和山水诗等，累计不足此时期诗词的四分之一。

在爱情诗中，《毁家诗纪》堪称千古绝唱，也是郁达夫诗词创作的高峰。《毁家诗纪》为组诗，有诗有纪，写于1936年春到1938年冬，历时最久，曾多次润饰、修改，发表于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旬刊第30期。组诗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记录了作者与他的第二个妻子王映霞的离异与婚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组诗将作者的家事与国事，特别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结合在一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又有对抗战军民同仇敌忾的礼赞与讴歌。不仅是作者不幸婚变过程的真实记录，同时堪称社会的一面镜子，明显地具有诗史价值。还应提及的是，如果说作者与前妻孙荃的旧式婚姻，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不能完全排除爱情存在的话，那么，同样道理，作者与王映霞的新式婚姻也不能就简单等于全是爱情，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非爱情的因素。这也是组诗《毁家诗纪》给人的启

发与教益。在风格上，这些诗篇与作者早期同类诗作迥然不同。早期作品感情宣泄缺少必要的节制，如水泼地，一览无余，而组诗如同陈酿的老酒，感情深沉，文字含蓄，留有读者咀嚼与回味的余地，显示了作者的成熟与老到。

在政论诗中，《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堪称作者政论诗的绝唱。其中的“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已经成为经久不衰的名句。此诗不仅以敏锐的眼光，战斗的艺术，成为郁达夫最为出色的政论诗，而且诗中表现的观点和感情对研究作者的思想与创作具有拨乱反正的特殊意义。

在山水诗中，《青岛杂事诗十首》较有代表性。组诗写于1934年7月，是作者应朋友之邀，在青岛避暑期间的创作。在一些文学史上，常常可以见到批评郁达夫在30年代逃避现实，寄情山水的文字，但往往对郁达夫逃避现实，寄情山水的另一面注意不够。《青岛杂事诗十首》，其中特别是带有开宗明义和总结性质的第一、十首政论诗，对我们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此外，这一时期，作者应鲁迅之请书赠鲁迅的《赠鲁迅先生》，亦值得注意与重视。

三

南洋时期，即1938年到1945年的7年间，是郁达夫诗词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据不完全统计，郁达夫在南洋期间创作诗词130余首，本书选注39首，不足此时期诗词创作的三分之一。其中主要是爱情诗。于1942年写于苏门答腊的《乱离杂诗》，现存12首，是作者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诗作。据胡愈

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介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海军太平洋舰队（当时的马来亚与新加坡均属英殖民地，故有英军驻防）在开战不到一周，便全军覆灭。另一方面，新加坡当局对新加坡抗日领袖不肯给予安全撤退的保护与便利，而当时的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机关也只要求英军保护领事馆等人员安全撤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在新加坡作过《华侨周报》主编、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和文化界抗战联合会主席的郁达夫，其处境之险恶，不言而喻。而组诗则是作者被迫逃离新加坡后对曾一度在新加坡闯入作者生活，并与作者相濡以沫的女友李筱英的回首与思念。在作者的笔下，李筱英既有女子的柔情，又有男人的阳刚之气；既懂得真正的爱情，又通晓爱情之外的世界。这是一个被作者理想化了的远远高出作者的艺术形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组诗既写作者的个人私事，同时又写国家、民族的大事，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而且表现了作者作为反法西斯战士的英雄品格。作者另外一组爱情诗《无题四首》，同样是内涵丰富，感情深沉的力作。如其中的第三首，表面写春秋时代秦族的表现，实际是隐喻作者在日本宪兵队的监视之下身陷囹圄的险恶处境；表面写汉代张敞画眉的韵事，实际是隐喻作者在战乱年代无暇顾及夫妻恩爱和儿女私情；表面写“飞将军”李广隐居、射虎，实际是隐喻作者寻找抗战的时机；表面写西施与范蠡为报国双双投湖，实际是隐喻作者为祖国、为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态度等等。

四

郁达夫的诗词，一般说来，具有感伤的特征。而这种感伤

的特征又因诗的不同而不同。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作者在南洋流亡时期，则一反过去的阴柔之美，明显地具有阳刚之气，又呈现一种豪放之美。大体说来，有下列一些特点。

细腻、缠绵、感伤的抒情，是郁达夫诗词，特别是早期诗词的重要特征。如作者留学日本时期写给未婚妻子孙荃的诗：1917年与孙荃订婚之后，很快便有寄给孙荃的诗。继之，又有《题〈阴符夜读图〉后奉寄荃君（三首）》、《寄和荃君原韵四首》、《题写真答荃君三首》、《寄和荃君》等诗作。这些诗有的是写“离愁”，有的是写“别恨”，有的是写“伤春”，有的是写“悲秋”，亦有作者生不逢时的慨叹与报国无门的悲哀。以《寄和荃君》为例，诗中一个“懒”字，便把抒情主人公“含泪”离开祖国，在日本为其未婚妻子“愁”苦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愁苦忧伤无可奈何的抒情主人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即便是赠送未婚妻子美丽动听的名号，也“别有伤心深意在”（《赠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清新、自然，淡淡的哀愁，是郁达夫诗词，特别是早期诗词又一重要特征。由于作者不肯与中国黑暗社会同流合污，在日本留学又深受种族的歧视与压迫，加之作者童年时代曾受到富春江美丽风光和自然山水的熏陶，长大成人后便自觉不自觉地到大自然中小憩，借以宣泄自己的哀愁。如《自述诗十八首（有序）》第四首作者对自己家乡充满感情的描绘：“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这既是对家乡历史悠久、美丽山水的礼赞，同时又暗含着作者有家不能回的淡淡的哀愁。又如《西归杂咏十首》中的《过西京。西京，日本旧都也，人号小洛阳，东山三十六峰，风景颇幽》：“寺楼钟鼓洛阳城，人指前朝幕府旌。不向东山谋一醉，独遮纨扇过西京。”这既是对日本旧都西京的赞美，同

时也是对祖国河山，特别是古都洛阳的怀念等等。

慷慨、悲愤，正气浩然，是郁达夫诗词，特别是后期诗词的重要特征。当然，郁达夫亦有不少风雅之作。这主要是指那些不肯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而又无力回天的洁身自好之作。它的渊源是出自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的人生哲学。但郁达夫归国后，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直到1945年秋被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为止，他慷慨悲愤的正气浩然之作远远超过那些洁身自好的风雅之作。其实，洁身自好的风雅之作与正气浩然的作品并不矛盾，前者是后者的条件与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的继续与发展，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以升华与提高。如，即使像《毁家诗纪》这样的爱情诗，亦时时不忘国家，不忘民族：“匈奴未灭家何恃？”“留取吴钩拼大敌”，“先逐寇，再驱雉”。而在作者的后期诗作《乱离杂诗》中的第十一首，作者更将个人私事与国家政事、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并且表示：“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在《离乱杂诗》的最后一首，作者则以天下为己任，以抗金英雄文天祥为榜样，唱出了“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的正气之歌。

① 《孟子·尽心上》。

目 录

序	(1)
前言	(1)
咏史三首	(1)
日本竹枝词十二首并序	(6)
西归杂咏十首	(24)
七月十二夜见某，十六日上船，十七日有此 作即寄（五首）	(38)
赠名	(46)
题《阴符夜读图》后奉寄荃君（三首）	(48)
寄和荃君原韵四首	(53)
辞祭花庵，蒙蓝亭远送至旗亭， 上车后作此谢之	(58)
自述诗十八首（有序）	(61)
题写真答荃君三首	(87)
寄和荃君	(91)
梦醒枕上作，翌日寄荃君五首	(93)
杂感八首	(98)

盐原诗抄十首	(113)
风流子·三十初度	(125)
扬州慢·寄映霞	(128)
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 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 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 今安在耶，固而有作	(130)
赠鲁迅先生	(134)
闻杨杏佛被害感书	(137)
青岛杂事诗十首	(140)
读郭沫若氏谈话纪事后作（二首）	(153)
毁家诗纪（诗十九首，词一阙）	(156)
得渝友诗柬，谓余尚不孤。实则垂老投荒， 正为僇子辈诟詈。因用原韵奉答， 亦兼告以此间人心之险恶耳	(194)
五月廿三别王氏于星洲，夜饮南天酒楼， 是初来时投宿处	(196)
与王氏别后，托友人去祖国接二幼子来星， 王氏育三子，长名阳春，粗知人事， 已入小学，幼名殿春、建春，年才五六	(199)
乱离杂诗（十二首）	(202)
无题四首	(221)